

(一) 考試本是查考學生學習情況和鑑定學生學業程度的方法，但其對學生和對教師，都是一個極大的負擔，因此無論中外，都有許多人主張廢除考試，但至今尚找不出一個有效而易行的方法來代替，誠如美國哈佛大學生物教授渥爾德 (George Walp) 所說：「我發覺對於受考人與考試人，考試是一種有創傷的經驗，我並不喜愛考試，但又想不出廢止考試以後如何可以辦教育」。共匪推行的「開卷考試」，從理論上來說，或者從表面上來看，乃是一種新的嘗試和進步的改革，而且可以逐漸形成制度，走向「廢止考試」的道路。但是，由於附有加強思想教育，照顧調幹份子等政治任務，不僅使考試變質，而且難免使考試失去查考學業的意義和作用。

(二) 「現場考試」、「場外考試」等，實具有實習的意義，此種考試如能與實習作有效的配合，未嘗不是一種較好的制度和辦法，不過目前這種制度和辦法，在匪區尚未普遍建立和正式使用。

(三) 所謂「開卷考試」，可以說是「教學改革」中的產物，「教學改革」的目的在「少而精」的原則下減少課程，精簡教材，以便加強政治教育與勞動教育，而「開卷考試」的推行，由於學習潛力無法發揮，學業競爭心無法提高，對於所謂「少而精」的教材，也不能達到預期的學習標準，在這雙重「改革」的影響之下，大陸教育的水準，必然逐漸降低。

(四) 在「開卷考試」中，過去考試考不好的學生，大都獲得很高的分數

，而過去考試成績很好的學生，分數反而降低，這不僅是一種不應有的偏差現象，而且顯示出「開卷考試」並非公平合理的標準，其對學生的心理，勢必產生不良的影響。

(五) 「開卷考試」在匪區雖已逐漸推廣，由於在這方面缺乏經驗，文科怎樣考，理科怎樣考，高年級怎樣考，低年級怎樣考，大家莫衷一是，同時在考題難度的估計上，對考試時間的掌握，大都和實際情況有出入，有距離，已經造成若干混亂現象；這種沒有統一方法和未經全盤設計規劃的制度，如果繼續推廣下去，必然造成更多的混亂和不良的後果。這不僅關係「開卷考試」制度本身的推行，對於匪區整個學校教育工作，必然會發生嚴重的不良影響。此項缺點共匪現正逐漸修正，但似非短期所能收效。

註一 五十三年九月十日共匪「人民日報」。

註二 五十四年一月十四日共匪「光明日報」。

註三 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共匪「光明日報」。

註四 五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共匪「光明日報」。

註五 五十三年九月三日、十二月十九日共匪「中國青年報」。

註六 五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共匪「人民日報」。

註七 五十四年七月六日共匪「光明日報」。

大陸知識份子問題現況的探討·上·

王

蘊

一、毛共思想與中國知識份子的

基本衝突

在馬列主義的經典中，認為知識份子於「革命」初發時，僅是「革命的酵母」。因為工農階級，即使有「革命」的要求，却沒有「革命」的知識和技巧，必須要知道份子滲入其中，溶化於工農階級之內，「革命」才能發生

作用的。這種論調，顯然是因先有俄共「革命」「叛亂」事實，然後才有這一理論的，為黨內知識份子掌握領導權的一種解嘲而已。以毛共說，它自始就是一個以「知識份子」為骨幹所組合的「黨」，然後用政治詭計，宣傳詐術，裹脅工農份子，發展武裝鬥爭，來奪取政權，竊據大陸的。

但知識份子與共黨之間，原也有「差距」的。然而知識份子倘一旦進入到共黨之內時，由於思想控制與組織控制，立刻會「中魔」似的為一種幻想所麻醉了。所以共黨宣稱，「共產黨員，是特殊材料做成的」。毛共初期，所提「知識份子問題」大半是對黨外的知識份子而言。不過由於毛共思想、政策的荒謬，時至今日，知識份子的問題，也發展到「黨的內部」了。

毛共祖述馬列主義，其思想本質，及文化生活，是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不相容，也與中國民族特性不相容的。所以無論毛共在「教育工作」上，「思想工作」上，如何地「微風細雨」，如何地「打鐵趁熱」、「改造」「培養」，對黨內外新舊知識份子而言，都是心勞日拙的。

中國歷史所表現的文化思想，是以孔孟學說為中心，以老莊哲學為支輔，形成中華民族和平容忍的第二天性。

近代 國父孫中山先生，發明了三民主義，創建了中華民國，其思想根源，是繼承孔孟而來的一貫的「道統」。用國家政策，來證明王道的、人性的具體實現。這一思想和政策，在大陸上，也浸潤人心近半世紀了，影響是極其深遠的。

毛共上台，一心想把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，和三民主義的現代政治思想，一脚踢開，一言否定，顯然這是老虎吃天、蜻蜓撼樹的事件。

代表中國文化思想的知識份子，無論他們的立身、處世、治學、從政，以及待人、接物，都是以孔孟學說，三民主義的道理為基本。比如立己，以仁愛和平為主，處世以忠恕信義為主，治學則以懷疑精神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教訓，審思明辨的方法；從政則以民本民主為依歸，志在裕民安民保民。至於待人接物，即崇尚正德厚生，民胞物與，至於作為社會結構的倫理組織由個人至於家庭，推己及人，由親及遠，主張互助共榮的。……這些理念，都是馬列主義、共產主義所不敢夢想的。當然毛共還要竭力加以曲解和攻擊。但在知識份子來說，他們的思想深處，仍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，

繫於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上。對毛共的暴力統治，只是一時的屈服而已，但一有機會，「反動思想」也會「冒出來」。十六年毛共對知識份子的「鎮壓」「改造」，波瀾起伏，道理在此，所謂中華民族的文化「韌性」「彈性」也或指此。

二、毛共對知識份子的分析

毛共對中國知識份子，以及它在「社會主義革命」所起作用，是極重視的。「文化隊伍」的筆戰，正和「武裝隊伍」的槍戰，有同等的意義。毛共說：「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，而戰爭是流血的政治」要搞政治的，則絕不能離開知識份子。所以知識份子，是毛共在政治戰場上的爭奪對象了。

但毛共又基於唯物主義觀點，和階級分析理論，它對中國知識份子，又作了較具體的分析，認為中國知識份子，具有若干特點：

中國知識份子，大部份出身於小資產階級，一部份出身於資產階級，極少數出身於工農階級。因此，他們的思想意識，大部份是屬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。

中國知識份子，政治警覺性較高，接受外來的知識能力也較強，在長期國家積弱之下，或半殖民地命運之下，只要有一定的策略運用，他們可能作為革命的先鋒或橋樑的。

中國知識份子，由於階級意識的存在，雖有若干革命性，但不能革命到底，在緊要關頭，他們會採取消極態度，或轉變為敵人。

中國知識份子，既來自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，一般都會脫離羣衆的，他們留在革命隊伍中，也常有主觀主義、個人主義、自由主義、本位主義、享樂主義與絕對平等主義等思想傾向。在政治生活的表現上，常處於散漫與動搖之中。

毛共基於這種分析，長期以來，對大陸知識份子，在原則上，是要澈底消滅中國知識份子原有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，建立起布爾什維克化的知識份子出來。非這樣文化思想工作，不足以做到「有破有立」。在進行的方式上，則採取「既團結，又鬥爭，既改造，又批評」的辯證法，如此繁複顛倒的運用之下，幾許知識份子，特別是一些老學人，都被它所侮弄所奴役了。

三、毛共對知識份子的策略演變

毛共對知識份子，舊的，要「改造」變成「紅色」，新的要「培養革命的接班人」，這是原則，久而不變的。但在某種角度，毛共根據它的政治形勢的演變，在策略上，也表示了有若干的變化。工作重點在何處？主要對象是什麼？這都說明了這一變化的內含。

當毛共竄據陝北以後，抗戰的初期，毛共竭力標榜「抗日統一戰線」，標榜「新民主主義」。這個時期，毛共執行的策略，是討好舊知識份子，吸收青年，以壯大自己。一九三九年十二月，毛澤東會親自起草關於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文件，在黨中央通過決定。毛匪指出：「沒有知識份子參加，革命是不可能的」；「對於知識份子的正確政策，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」，就可想見毛共的企圖了。這一時期，陝北一時成爲左傾青年淵藪之地。

在另一方面，對我中央政府展開政治鬥爭。毛共持着「抗日統一戰線」這面黑旗，在各種「政團」中，拉攏高級知識份子，進行「拉左打右」之戰。也製造若干政治高潮。直至抗戰結果，毛共旗下的「文化隊伍」，也就日益壯大了。但如與國民政府治下相較，這支隊伍，也是殘破幼稚可笑的。

一九四九年，毛共竊據大陸，無論在政治上、文化上、經濟建設上，都需要大量知識份子的合作，提供知識，提供技術，發揮力量。因此，毛共即大言炎炎的，說要把大陸五百萬知識份子（其中有十萬高級知識份子）「包下來」。「包下來」是有二重意義的，一種是負責解決工作和生活問題，作爲一時安撫誘騙之計，一種是批判改造，控制奴役，一任毛共的播弄。

直至一九五六年，毛共的思想工作，重點是在促進舊知識份子的學習和改造，作爲「習染紅色」的過程。

思想改造，也並不是完全「自我教育，自我改造」，還要接受外來的「挑戰」，外來的「清算鬥爭」。而且毛共爲了配合「農業、手工業、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」，思想改造的清算鬥爭，其激烈慘酷程度，并不下於農村的「土改」，城市中的「肅反」，流血流淚，所在多有。

毛共認爲，一切工作，思想先行。它在思想改造期間，把舊知識份子，在人民心目中的「偶像」，一個一個侮蔑擊倒，然後毛共的思想權威，才能

樹立起來。這是毛共陰謀的中心所在！

一九五六年，毛共的政治形勢，已全面控制了大陸，社會上若干的政治阻力，也已次第肅清，但毛共深切知道，舊知識份子，雖然在表面上「順服」，但骨子裏，仍是「不可靠的」。這些知識份子，在暴力統治下，有的「痛心接受」，有的「含淚恭維」，他們的「心」，還沒「交」出來。於是，毛共想發掘內部的「敵人」，又使了一種「詭計」，那就是「大鳴大放」。先是毛共以「卑詞厚禮」「自省自反」的惺惺作態，以「言者無罪」的且且信誓，故意使用「驕兵之計」，把知識份子捧上天，把「非共」「反共」的內情激發出來。知識份子，久困於苛政之下，一旦覺得統治者如此「禮賢下士」，真有點「飄飄然起來」。因此滿懷抱着個人知識尊嚴，近代民主政治的熱望，就輕意地墮入了毛共的紅色陷阱了。在鳴放期中，機關學校大字報上的文字，座談會上的發言，以及報章雜誌上的批判，讀者投書等，一時是熱鬧精采、痛快淋漓的。但後來就成了清算「右派份子」的「鐵案」。

毛共發覺到「右派份子」，竟如此衆多，連若干所謂的「積極份子」「英雄人物」「進步人士」，現在都卸下了偽裝，點燃內心的「反共」無明之火，都藉「鳴放」假民主的氣氛下冒了出來。使毛共非常駭怪而無所措手足。毛共擔心再這樣發展下去，將無法處理。因此，只好「鳴金收兵」，「鳴放」也就戛然而息。估計全大陸的鳴放時間，還不到半年，一九五七年六月，匪人民日報發表了一連串的社論，說明了「大鳴大放」，是毛澤東對知識份子一個得意的「陽謀」。「反右鬥爭」，就成爲「陽謀」的最後結局。

此後，全大陸知識份子，在鳴放期中，有文字語言紀錄的，都成了待罪的羔羊，內心之哀憤，是可想見的。

毛共的「反右派鬥爭」的結果，使知識份子更清楚地認清了毛共的「獨裁專政」的面貌。所以自「反右」以後，知識份子彰明較著的正面的「反共」言論，是十分沉寂的。無已，他們走曲線，行偏鋒，在若干學術討論上，暗示「反共」意識。借古人的酒，澆自己心中塊壘者有之；評隲古人，暗指今事者有之；繼承與批判的爭論，人性人道的發抒，也還是存在的。不過，毛共似極警覺，認爲這些，也還是「反共」的思想暗流。因而，今日的思想鬥爭形勢，又轉入到「反修正主義」的道路上去了。其主要對象，還是知識份子。